



中国 国防经济历史形态

姜鲁鸣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国家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

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

姜 鲁 鸣 著

107156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20号

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

姜鲁鸣 著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云放马峪印刷厂
开 本	32开 15.25印张 323千字
版 次	1995年9月第1版第1次
印 数	1—2000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3号

邮编：100091

ISBN 7—5626—0678—1/D·304 定价：16.00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国防经济规模发展的基本趋向.....	(11)
第一节 国防费规模发展的历史轨迹.....	(11)
第二节 军事人力规模演变的基本趋势.....	(29)
第三节 历代战略物资储备规模.....	(37)
第四节 国防经济规模变动的基本特点.....	(48)
第二章 中国国防经济规模制约因素的历史分析	(61)
第一节 引发国防经济规模变动的需求因素	(61)
第二节 制约国防经济规模变动的供给因素	(72)
第三节 影响国防经济规模变动的其他供给 因素.....	(100)
第四节 简短的结论.....	(124)
第三章 中国国防经济规模效果的历史评估.....	(127)
第一节 国防经济规模与国家安全.....	(127)
第二节 国防经济规模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 响.....	(137)
第三节 国防经济适度规模评价.....	(159)
第四章 中国国防消费结构的历史演变.....	(166)
第一节 国防消费构成及其变动.....	(166)

第二节	国防消费结构变化的基本特点·····	(194)
第三节	国防消费结构变化的动因·····	(205)
第五章	军工生产布局·····	(220)
第一节	国防生产力布局的制约因素与基本 指向·····	(220)
第二节	中国古代军事手工业布局·····	(227)
第三节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布局·····	(251)
第六章	国防农业布局·····	(292)
第一节	国防农业布局的基本问题和主要矛 盾·····	(292)
第二节	农业人口分布的调整·····	(296)
第三节	非战时和局部战争中的粮产区布局 调整·····	(304)
第四节	战时后方农业基地建设·····	(317)
第五节	军用畜牧业布局的变化及其政策调 整·····	(331)
第七章	国防交通运输布局·····	(341)
第一节	中国古代国防交通运输布局·····	(341)
第二节	中国近代国防交通运输布局·····	(358)
第八章	中国国防经济管理体制的历史分析(上) ·····	(376)
第一节	中国国防经济管理体制演变的基本 过程·····	(376)
第二节	宏观决策与调控体制·····	(384)
第三节	国防费分配体制·····	(391)

第九章 中国国防经济管理体制的历史分析(下)	
.....	(408)
第一节 国防生产管理体制.....	(408)
第二节 军品调拨体制的变革与军品商品化	
.....	(442)
第十章 国防基础产业政策	(456)
第一节 保护国防经济基础产业的政策.....	(456)
第二节 国防经济潜力与国防经济实力建设	
相协调的政策.....	(467)
附图表	(477)
后 记	(479)

绪 论

中国国防经济的历史形态，亦即中国国防经济的规模、结构、布局、体制等基本经济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发展变化的形态。研究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的出发点，在于客观分析中国数千年国防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变化特点，科学地掌握国防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一、中国古代国防概念的界定

国防，就其本意而言就是主权国家为捍卫自身主权、领土完整、防备外来侵略所采取的一切防务措施和行为。在中国成为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之后，这一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是非常明确、清晰的。但是，在清朝完成统一以前，即18世纪50年代以前，对中国来说，国防这一概念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显然，只有弄清这一问题，才能确定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的研究范围。

中国古代史上的国防，本意是指为维护国体、礼义而采取的防禁措施^①。与现在国防概念相近的是“边防”^②。边

①《后汉书·孔融传》曰：“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

②《新唐书·兵志》：“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此自武德至天宝以前边防之制。”

防问题是中国古代国防概念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内容。

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表示边防和边境的词汇就已大量出现，如“边塞”、“边陲”、“边际”、“边圉”、“边头”、“边疆”、“边寄”等。这些“边”的概念，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边界。它们都不是很清晰、固定的边境地理分界线，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即以中原政权为中心的统治边缘——“治”与“不治”的相对分界线。

中国古代的边防问题，导源于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矛盾与冲突。从特定的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国防经济史，就是一部华夏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不断交流、冲突、融合的历史。由于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内部开阔而富饶，形成了以冲积平原为基地的农业文明圈和以灌溉型农业为基础的发达的农耕文化。在这一发达农业区的四周，被称为夷、狄、戎、蛮“四夷”的非华夏民族，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中原的华夏族。地处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更是如此。英国历史学家曾总结说：世界上最初的文明出现“在少数农业特别集约的地区”，但“游牧民族由于渴望享受文明的成果而发动进攻，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老问题。”^①在中原以北以南这两个方向上，也存在着游牧民族对热带、亚热带农业民族的滋扰和抢掠的老问题。其中，来自北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的侵扰威胁更大。这些民族的生产与生活主要不是依托于固定的土地上，而是逐水草迁移，依赖于游牧业的兴衰。因此，其经济基础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很有可能一场突如其来的

①《泰晤士历史地图集》2，《最初的文明》，三联书店中文版。

暴风雪就会使牲畜大量死亡而使他们的生活与生产难以为继。这时候，生存的需要便驱使他们以马背的优势对中原财富进行掠夺，从而构成对中原国家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

面对这种现实威胁，历代国家政权往往采用三种基本方式：一曰安抚、控制，二曰“以夷制夷”，三曰武力平定。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间的军事对抗与冲突，就其实质而言也是中华各民族发生交流与融合的一种特殊形式，一种必要的外部强制力量。这种形式的民族交流往往会产生四种后果：一是文明程度比较落后的民族同化于中原的华夏民族，其归宿是落后民族的消失和先进民族的壮大（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二是形成以汉民族为核心的政权（如秦汉隋唐明朝时期）；三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全国统一的多民族联合执政的政权（如元、清朝时期），其归宿也是这些民族逐渐同化于汉族文化；四是在激烈的军事对抗和冲突下，部分少数民族难以同化于中原民族而迁徙他地。

由此可见，古代战争是中华民族大融合、大联合的冲突形式，也是它的基本形式。包括暴力掠夺和武力征服在内的华夷矛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同时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作用。因此，这种从现在看来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对抗，在当时则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实际上在当时就是国防问题。可以说，中国古代国防的主要问题，是中原民族如何加强边防以有效地阻止并反击周边民族政权的侵扰问题。

构成这一时期军事斗争的另一方面内容是各政治势力割据、相互争伐并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自然，用

“大一统”的眼光审视中国古代史上处于分裂时期的各个国家政权，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似乎还谈不上是什么国防问题，但正因为它们大都具有国家政权的性质（如三国时期的魏、蜀、吴等），同时在其动员社会经济力量进行战争准备和实施战争保障方面，也具有国防经济运行的一些基本特点，因而对这种武装冲突也应历史地看待。

因此，应当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国防的问题，应当以清朝完成统一后的清朝版图为依据，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国防问题：凡是历史上在这一疆域上的中原民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冲突和战争，凡是在这一疆域中国家处于分裂时期的各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都是本书所要考察的国防问题。

当然，进入清代尤其是近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国防问题则有了完全不同于古代国防的涵义。虽然清前期也有诸多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但一般说来，这些边疆地带的民族大多不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民族政权，不再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因而这些矛盾就表现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内部矛盾和冲突。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从17世纪下半叶清军反击沙皇俄国军队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起，国防开始具有了主权国家防务的近现代意义。

二、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意义

既然中国国防经济史所要研究的主要范围是服务于国家防务的经济，因而它与军事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军事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囊括了各历史时期各军事主

体的所有军事经济和战争经济的问题，如因国内民族冲突而发生的战争经济，社会两大基本对抗阶级之间的战争经济，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间的战争经济，以及产生于国防需要的军事经济等等。显然，国防经济史所涉猎的研究领域要小于军事经济。它的主体是单一的，即主权（或带有主权色彩的）国家；它所担负的主要职能是对外的，即主要是以国家防御为服务目标的军事经济职能。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国防经济与军事经济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剥离的。中国历史上的国防经济，在结构、体制等诸多方面都要依托于各历史时期的军事经济，在很多情况下国防经济是寄存于军事经济母体之中的。纯而又纯的国防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不存在的。要考察历史上的国防经济，在很多情况下也就离不开观察作为服务于一般战争和军事需要的经济体系。因此，本书所界定的国防经济只具有相对意义。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为了叙述的方便，经常需要以“军费”、“军事运输”等数量来测定国防费和国防运输的投入量。

研究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亦即中国国防经济史的宏观运行是本书的主旨。

国防经济，就其所包含的内容而言，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关系，即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以及国防经济内部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前者主要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在规模、结构、布局、体制和国家政策导向等方面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状态、水平，才能使国防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实现最佳的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后者主要涉及国防经济自身的规模、结构、布局和体制如何达到和保持最佳状态，以便在国防投入

既定的前提下获得最大的产出。

显而易见，对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首先，这一研究对国防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国防经济理论体系，通常由三大部分组成：国防经济基本理论、国防经济史、国防经济学说史。到目前为止，国防经济史的研究最为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系统地分析中国国防经济历史中的宏观运行问题，有助于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国防经济史是国防经济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有待于对国防经济历史规律研究的开创与拓展。比如，对国防经济规模的研究，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大跨度的历史分析而难以继续深入。中国国防经济规模的制约因素究竟有哪些？中国国防经济的绝对规模与国家安全，相对规模与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量化关系又是怎样的？要真正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历史规律研究与现实经济关系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对我国国防经济规模及其相关因素的历史发展进行大跨度的分析论证，以完善、充实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国防经济规模的基本理论。

从实践方面看，对中国国防经济历史形态的研究可为我国现阶段国防经济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依据。在研究我国现阶段国防建设的过程中，仅限于对眼前的国防经济状况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从纵向上把握历史上的国防经济与现阶段国防经济的内在关联。要合理、科学地确定适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国防经济的规模、体制、结构、布局，提高国防经济效益，就必须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国防经济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的发生和发展的基

本问题，尤其应当研究中国国防经济史的一些基本经济规律、基本经济范畴和国防经济运行的基本经验教训。如果不很好地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忽视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就难以更好地协调好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就难以减少前些年类似“三线建设”那样的国防建设中的失误。

三、中国国防经济的形成和 国防经济史的分期问题

国防、国防经济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随着国家对内、对外军事职能等“公共权力”的建立，为国家防务服务的物质因素也随之产生。因此，中国的国防经济滥觞于夏王朝当不成问题。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国防经济也经历了萌芽、形成和进一步成熟、定形等几个阶段。

笔者以为，中国的国防经济萌芽、发展于先秦，至秦汉时期才形成相对独立的、较为典型的形态。是说根据有二。

其一，到秦汉时期，作为国防经济运行主体的国家，在形式上臻于成熟，国家数量大大减少，形成以一个中央国家政权长期存在或数个国家政权短时并存的政权格局。

定形、成熟的国防经济，必然依托于较为发达的国家政权母体。而在中国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国家的发育水准却很低。据古文字专家考证：“国”从“回”从“戈”。“戈”形音，“回”会意，意即城之外垣之形。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是以城邑为主体的，城即为国，国就是城，一国的主体城一破，国家自然灭亡。所以，早期国家观念中的领土意

识极为淡薄、含混。在当时，除了都城之外，一个国家的疆域边界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西周时期周王朝统治范围之内，就存在许多并不臣服于周的小国，当时镐京郊外就是大戎国。

到春秋战国时期，早期国家形态开始转型：君主的权力日益强化，文官制度开始形成；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也让位于编户齐民的社会体系。秦汉时期，最终形成了以皇帝极权为基本特征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与此相应，国家的数量也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的变化。夏朝号称有万国，商和西周也有数千国，春秋时缩小到100多个国，到战国末期就只剩下十几个国家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多国家政权并存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起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由此，中国国防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较为定型、成熟的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大及国家整体防务的需要，产生了国防经济的规模、结构、布局、体制等诸多问题。

其二，国防经济各主要部门已脱离民用产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相对独立的国防经济体系。

先秦时期的国防经济，基本上还是一种融汇于一般社会经济机体之中的经济，并没有与一般民用经济分离而呈相对独立的形态；国防经济各部分之间缺乏比较细密、专业化较强、相对固定的分工协作关系，在生产、流通、分配等环节上，还没有诸多专职部门的产生。有战则行，无战则止是这一时期国防经济运作的基本特征。春秋战国以后，尤其是秦汉以后，国防经济开始产生一系列变化：军粮供给来源已不再仅仅依赖于民用农业，随着军事屯田的产生与制度化，国

防农业生产部门开始从民用农业生产部门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体系；军粮储备也已不再是或已不主要是“储粮于民”，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仓储网路和军粮调拨体系；一大批专门从事兵器和军品生产的工场从兼产农具、兵器、皇室贵族用品的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管理军工生产的机构也逐渐由类似少府这样的皇室御用机构而转至军器监等专事兵工生产的机构；在冷兵器时期以及冷兵器和旧火器并用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战马生产，也以其规模庞大、管理集中的军马场形式而取代了那种从民用马和御用马中提供军马的单一方式；更有意义的是，在国防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流通、分配和管理体制上，都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的体制。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防经济逐步建立起来。

中国国防经济产生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因而对反映其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特征的分期问题，就不能简单地采用朝代更迭为特征的通史自然分类法。

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①同理，不同国防经济时代的区别，也不在于消灭什么样的敌人，而在于怎样消灭，用什么作战工具（武器装备）去消灭敌人。中国国防经济的客观进程表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引起了武器装备的迅速变革，从而又引起作战方法和军队编制构成的变革，国防需求在结构、总量、布局、体制等方面也由此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据此可以说，作战工具（即武器

^①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第204页。

装备)是衡量国防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度,也是划分国防经济时代的标志。由于作战工具在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三次质的变化^①,因而中国国防经济以作战工具的变革为标志,先后经历了冷兵器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0世纪60年代初)、冷兵器与旧火器并用时代(10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初)、火器时代(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初)、机械兵器时代(20世纪10年代初至20世纪40年代末)^②。

①即冷兵器到火器的质变;火器到以机器为动力的机械兵器的质变;机械兵器向自动控制和核能、定向能束兵器的质变。

②详见笔者与库桂生合著的《中国国防经济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

第一章 中国国防经济规模发展的基本趋向

国防经济规模是一定时期内国家投入至国防部门的资源要素的积聚总量。从宏观上分析数千年的中国国防经济，首先应当确定其规模形态演变的基本走向。为此，必须对构成国防经济规模基本要素的国防费规模、军事人力规模、国防战略物资储备规模的演进过程进行大跨度的动态分析。

第一节 国防费规模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研究的视角

国防费规模是国家用于国防开支的经费数量。国防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主要依托于国家财政的经济形态，因而国防开支的规模集中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防经济实体中资源要素的集约度。然而，研究中国数千年国防费发展、演变的长期趋势，在各历史时期的国防费开支中寻求具有可比性的共同指标系统，是极为困难的。

首先，有关中国历代军费开支的具体数额的记载十分缺乏。在中国古代史上，除了宋、明、清等少数几个朝代的部分年代有明确的军费开支记载以外，大多历史时期有关军费的记载都是局部的，反映国家年度军费开支的记载极为罕见。事